

在变通与叛逆之间

——郑振铎的翻译思想研究

杨帆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英语系, 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郑振铎是五四时期杰出的翻译家。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颇有贡献,他最早向国内译者介绍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论证了文学书的可译性,呼吁统一文学译名,提倡语言适度欧化,探讨译者的责任并且对中国近代翻译史进行评述,这些论述对当时的翻译理论建设起了示范指导作用。

[关键词]郑振铎; 翻译思想; 文学翻译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6.03.028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6)03-089-03

一、引言

郑振铎从五四时期开始文学翻译工作,在之后的几十年坚持从事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研究。他翻译了泰戈尔的《新月集》与《飞鸟集》,并为泰戈尔写了传记,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一阵“泰戈尔”热。不仅如此,郑振铎对翻译理论的探索也颇有建树,对当时翻译界的一些热点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向国内译者介绍了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提议统一文学译名,提倡语言适度欧化等,对当时的翻译理论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二、郑振铎的翻译思想

(一) 文学的可译性

《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是郑振铎的第一篇正式的专门探讨翻译问题的文章,发表于1921年3月的《小说月报》。文中,郑振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文学书能够译么?”在我国,翻译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翻译的可能性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但是自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人们对文学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许多人怀疑同样的思想是否能完全用另一种语言传达。郑振铎认为这些人的看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俗的,一种是哲理的。通俗的见解认为文学的风格是无法翻译的,译者要么在译作中译出原文的具体思想,要么只能一段一段地意译原文,译文与原文必然存在着一定差异。哲理的见解则指出原作的文字与思想、实质与风格密不可分,因为风格不能翻译,所以文学书也绝对不能翻译,尤其是诗歌。诗歌之所以优美,是因为其音韵的存在,作者情绪是通过音韵表现的,在翻译中,音韵势必发生变化,则诗的情绪就无法传递到译文中。

针对这两种看法,郑振铎提出了自己主张:“文学书是绝对的能够翻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的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1]他认为,文章的

风格即“表白”,其本质是用文字表达作者的思想。而在思想层面上,不同国家的人们有着共通性,那么思想也能从一种文字转移到另一种文字上。他强调思想与“表白”并不是不可分割的,“表白”是可以随作者意愿改变的,但无论“表白”如何改变,所传达的思想却可以做到始终如一。同样,诗的音韵和本质也是可以分开看待的。诗中的思想和情绪并非完全依赖音韵以表达,音韵改变了,但改变的音韵仍然可以表达原诗的情绪。而译者的翻译水平决定了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倘若译者的文学功底深厚,翻译技巧娴熟,完全能够将文学书的思想传达到另一种文字上,甚至其艺术之美也能够充分传达。固然,翻译会造成部分损失,但只是损失了原文的语言,并没有损失原文的思想和语言之美。翻译是文化传播的根本方式之一,“文学不可译”的观点是狭隘的,其本质是否定了文化与文学书在国际间的交流与传播,否定了世界文学存在的意义。

郑振铎对于文学可译的论断,有理有据,得到了鲁迅、矛盾等人的赞同和支持,在理论层面上肯定了文学书的可译性,打消了一部分怀疑论者的顾虑,坚定了当时的翻译工作者和读者信心,促使更多的翻译爱好者大胆走上翻译道路,积极探索翻译技巧,促进了我国翻译事业的进步和突破。

(二) 提议统一译名

在1921年6月的《小说月报》上,郑振铎发表了文章《审定文学上名辞的提议》。文中,郑振铎将文学上的名辞分为五种:文学家的名字,文学史上的地名,文学作品的名称,文学作品中所有的主要的人名与地名,批评文学上诸名辞。此前,傅兰雅、高凤谦、梁启超、罗振玉、林纾等人都分别提出过统一译名的问题,但较之前人,郑振铎是首位提出“文学上名辞”的统一问题,并在文学刊物上展开讨论的学者^[2]。他认为文学作品中的人名、地名以及文学术语的译名不统一,容易引起读者的迷惑

[投稿日期] 2016-05-26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编号:FJJKCG14-145)

[作者简介] 杨帆(1983-),女,福建福州人,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应用语言学、翻译理论。

甚至误会,以至于丧失了阅读的乐趣。同样,对于译者或者学者来说,也有着相当的危害。译者在翻译人名、地名、书名等名称时,往往需要自创一词进行翻译。倘若有统一的译名,则译者可以直接使用,避免了重复翻译的工作。

同时,郑振铎提出用“译意”的方法翻译大部分的文学作品名称及文学术语,而对于人名、地名及小部分书名,宜采用“译音”的方法。其中,针对音译,郑振铎提出了三个注意事项。

第一,音译时应按照原文的读音,而不能由第三种语言转读。第二,读音相似的人名应用不同的译名加以区别。第三,译人名时应连名带姓全部译出。对比目前的翻译方法,不难看出,郑振铎对于人名音译的意见具有极大的科学性及前瞻性,受到翻译界的普遍认可。对于文学术语的翻译,郑振铎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具体的翻译方法,但是对许地山和耿济之提出的方法进行分析与对比,中肯地阐述其优缺点,建议用汉字来审定文学上的名辞,并鼓励广大读者参与讨论,集思广益,不断改进现有的翻译方法。最后,郑振铎建议创办文学名辞审定会,审定并统一所有的文学术语。

郑振铎对于统一文学译名的提议在当时的翻译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的提议有助于加速文学名称统一标准的产生,方便读者的阅读,提高译者的效率。为我国翻译事业发展提供了具体的方法。

(三) 肯定译者的作用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文人加入到了翻译的行列。但是也有不少文人学者强调创作,忽视翻译的作用,认为翻译不过是附属事业,文学创作才是对文学发展有意义的活动。打击了部分译者的翻译积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郑振铎对轻视翻译的言论提出了批评,并得到了鲁迅、矛盾等人的赞同。

郑振铎充分肯定了翻译活动和译者的重要作用,认为译者的作用非常重大,承担了介绍别国优秀文学的重任,其功劳不亚于作家。号召译者正视自己的作用与责任,选择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外国文学进行翻译,优先选择那些能改变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作品,或引导中国人与现代思想接轨的作品,充分体现了郑振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意识^[3]。

同时,也鼓励译者积极研究翻译的艺术,对待翻译作品的质量应当慎重把关。他指出只要能熟练运用本国语言和译语语言的人就能从事翻译,不一定必须具有优秀的文学素养和创作才华,当然,有创作才华的人从事翻译,其翻译作品的水平可能会高于他人的作品,创作才华在翻译工作中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郑振铎的这一理念激励了广大翻译爱好者加入到翻译活动中,给予译者信心并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吸引了越来越多懂外语的文人、

学者和留学生加入到译者的行列,扩大译者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文学作品的译者数量有了明显上升,译著的数量和质量也不断提升,文学翻译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

可以说,翻译家是促进不同国家之间文学交流的桥梁,毕竟没有人能读懂世界上的所有文字,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的传播主要靠翻译家的辛勤工作。郑振铎呼吁广大翻译家和翻译爱好者慎重对待翻译作品,提高自身翻译水平,明确自身的责任和作用,为我国翻译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

(四) 介绍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

在文学翻译上,郑振铎也是较早对翻译方法及原则进行探索的学者之一,并且积极开展普及先进翻译理论知识的工作。郑振铎最早向中国的翻译工作者介绍了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详细评述了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即:1. 译文必须能完全复写出原作的原意。2. 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与原作属于同一性质。3. 译文必须与原文一样通顺^[4]。

不难看出,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与严复的“信达雅”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就逻辑性而言,严复的“信达雅”还是更胜一筹。但是,“信达雅”理论过于简略,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解读,而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表述较为详细,易于译者理解及运用。然而,郑振铎并没有盲目推崇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而是理性地对其进行分析论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的看法可归结为两点,一是认为这三条原则并非并列关系,而必须以忠实为第一要义,二是强调避免走“死译”与“放纵”两个极端。针对泰特勒三原则中的第一条,郑振铎表示赞同泰特勒的反对“死译”的看法,不赞成译者在翻译时对原文进行自由地增删。对于第二条,他也极为赞同,认为只有达到了第二条才算好的翻译,但同时也承认做到风格与原文完全一致有一定难度,建议在忠实的范围内,尽可能把原文的风格移植到译文中,如果实在无法做到,则宜牺牲风格,而保存原文的意思。对于第三条,郑振铎强调翻译时找到平衡点,既不能太死板的直译,又不能随意的增减原文,把握好“直译”与“自由”的度,才有可能译出质量上佳的作品。

关于“信达雅”理论,郑振铎也同样坚持“信”是首要条件,批评一些译者为了“达”和“雅”而牺牲“信”的做法是相当不可取的。认为即使是直译,只要文章不至于在中文中不通顺,仍视为“达”,但如果任意增删,甚至改变原文的意思,虽然“雅”,却不足为道。

郑振铎的这些论述结合了他自己的翻译经验,对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和严复的“信达雅”进行了理性深入地分析解释,将西方的翻译理论介绍给更多的中国读者和译者,在当时可谓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中国近代的翻译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语言适度欧化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增多，部分学者认为吸纳西方进步思想，有利于开启民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发展，因而翻译了大量西方的社科专著及文学作品，向中国普通百姓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及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寻求救国发展之道。在这一背景下，语言“欧化”的问题日渐进入译者们的视野。傅斯年就“欧化”提出主张“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词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5]。1921年，郑振铎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文艺丛谈》，并组织讨论，不少作家在各大报刊上就此发表文章，讨论相当热烈，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郑振铎认为，当时中国的文体过于陈旧，束缚了作者的思想，使作者的情绪和思想无法细致到位的表达，所以，他对于语体的“欧化”持赞同态度。同时，他也强调欧化并等于简单的模仿，必须把握好欧化的程度，可以适度对中国传统的语体进行修改，但也必须做到让中国读者看得懂。除郑振铎外，鲁迅、茅盾、傅斯年、胡适等都发表过支持语言欧化的言论，认为语言欧化能够丰富群众的语言。

语言的适度欧化，打破了中国传统文言文的束缚，为译者解放思想，探索新的翻译方法提供了前提条件。适度欧化的汉语能够更精确的表达新思想、新情感，具有更强的包容性，提升了汉语的表现力，是汉语生命力的体现，也是语言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包括郑振铎在内的大批学者，不断探索符合汉语语言特色的文体发展道路，寻找中国读者能接受的语言表达方法，为汉语言的逐步成熟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郑振铎提出的“语言适度欧化”原则，鼓励译者积极探索，转变翻译思维，激发了译者的翻译热情。同时，也充分体现了郑振铎翻译思想的预见性，对推动汉语言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三、总结

郑振铎在翻译理论，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上均有独到的见解。在翻译理论方面，他强调文学作品的可译性，消除了部分译者的疑虑，增强了译者进行翻译工作的信心。他充分肯定了译者的重要作用，鼓励译者们正视自己的作用和责任。在翻译的原则方面，他向中国译者和读者介绍了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翻译需在忠实的基础上表现原作的风格。在翻译方法上，郑振铎提议统一译名，以及提倡语言的适度欧化。统一文学译名为译者翻译文学名称提供了统一的标准，避免了混乱和误会，减轻了译者的工作量。而语言的欧化则是对中国传统文体的一次革新，赋予汉语更强的生命力与表现力。郑振铎的一些理念与西方的翻译理论相类似，在思路上也与今天的翻译理论一致，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与前瞻性。通过对郑振铎翻译思想的梳理和分析，从中汲取精华，学习优秀翻译家对待翻译的严谨态度和追求进取的探索精神。

参考文献：

- [1] 郑振铎. 郑振铎全集（第二十卷）[M]. 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51.
- [2]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234.
- [3] 张娟. 从《飞鸟集》看郑振铎的翻译理论与技巧[J]. 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9):52-54.
- [4] 李心田. 泰特勒翻译三原则的汉译再辨正——兼论严复三字原则和泰特勒三原则乃异曲同工之作[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11):46-49.
- [5] 欧阳哲生主编. 傅斯年全集（第一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132.

[责任编辑 王云江]

Flexibility or betrayal —— Study on Zheng Zhenduo's translation theory

YANG-Fan

(English Department, Fuzhou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rade, Fuzhou 350001, China)

Abstract: Zheng zhenduo was a prominent translator in the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He provided relatively mature viewpoints for long-time disputable issues on translation. He was the first translator who introduced Tytler's "thre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and emphasized that translation must b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text in the content. Besides, he demonstrated the translatability of literature works, called on the unification of the literary terms, advocated the Europeanization of language, further discussed the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y and commented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China. His translation thoughts provided guidelin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at his time.

Key words: Zheng Zhenduo; translation thoughts; literary translation